

世界人口形势 2020年

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以成为经济发展速度和
进程的重要推动因素

大卫·E.布鲁姆

人们常说“人口决定命运”，即一个国家人口的规模、增速和结构决定了该国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这句话突出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塑造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和机会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一些关系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挑战和机会。

不过，如果说人口决定一切则不免夸张，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轨迹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都受到经济激励、政策和体制改革，以及科技、文化规范和行为变化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口增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变化。

人口增长

世界人口经过 5 万多年才达到 10 亿。自 1960 年以来，每隔 1 至 2 个十年，世界人口就会连续增长数十亿。1960 年，世界人口为 30 亿；2000 年左右，世界人口达到 60 亿；联合国预计，到 2037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90 亿。然而，世界人口的增速正在不断放缓，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超过 2% 的年增速高峰降至当前的 1% 左右；而到 2050 年，增速会继续降低一半。

从 1960 年至 2000 年，虽然全球人均收入增长了 1 倍多，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 16 年，小学教育已几乎在全球普及，但是人口的飞速增长却为个人和公众带来了诸多严峻的挑战，例如对食物、服装、住房、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吸收相当数量的人从事生产性工作，环境保护变得日益严峻。虽然相对而言，全球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正在逐渐放缓，但是，世界人口每隔十年的增量仍十分庞大，且人口基数越来越大。

从一定程度而言，早期对全球人口爆炸的担忧目前已被对特定国家和地区人口迅猛增长的担忧所替代（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事实上，全球人口增速的整体放缓掩盖了一个事实——就发展状况和地理区域来看，世界人口的分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1950 年，被联合国归为欠发达的国家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68%；而如今，该比例已升至 84%。这个比例会继续攀升，因为据预计，在未来 30 年，世界净增的近 20 亿人口几乎都将来自欠发达地区。这令人忧心忡忡，因为和更为发达的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往往在政治、社会、在经济和生态方面更为脆弱。

就人口数量而言，拥有 14.4 亿人口的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印度，目前拥有 13.8 亿人口。但是，到 21 世纪 20 年代末，印度将跃升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预计将达到 15 亿，高于中国 14.6 亿的人口峰值。尼日利亚（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和巴基斯坦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人口大国。2020—2050 年，两国的人口将进一步激增。亚洲仍将成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最高的地区，但这个比例将不断下滑（将从当前的 60% 降至 2050 年的 54%）。

尽管全球人口仍持续增长，但是从 2020 年至 2050 年，目前占世界人口 29% 的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计将出现负增长，其中降幅最大（-23%）的国家预计为保加利亚（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东欧移民大潮”）。

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

人口规模和增长体现了死亡率、生育率和国际移民的潜在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并且有助于解释各国在经济活动和运行方面的重要差异，例如在实物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福祉与增长，以及贫困和不平等方面。

这些因素普遍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比如战争和治理危机的爆发与结束。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人口的增长还与“人口过渡”这个现象有关，“人口过渡”指的是从高死亡率向低死亡率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出生率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的大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的平均寿命一般为 30 岁左右。但是，从 1950 年至 2020 年，人类的预期寿命从 46 岁延长至 73 岁，而且

在未来数十年内，相较于较发达地区，人口将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福祉。

到2050年，人类的预期寿命预计还将继续延长4年。此外，到2050年，至少有9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寿命预计将超过80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届时将达到39%。寿命的延长是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它反映了整个生命周期内，人类的生存前景（尤其是婴儿和儿童的生存前景）得到了改善。

不同国家预期寿命的趋同趋势持续加强。例如，1950年，非洲和北美的预期人口寿命差距为32年；2000年这个差距缩小至24年，目前已缩小至16年。一直以来，不同国家在卫生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且预计未来也将保持这种趋势，这反映了中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和营养状况不断提升，创新在医疗技术和机构中日益普及，同时国际援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育龄女性平均都会生育5个孩子左右。而现如今，女性平均生育不到2.5个孩子。这大体反映了如下事实：儿童抚养成本持续上升（包括主要体现在女性工资里的机会成本）、有效避孕渠道不断增多，以及人们对收入的不安全感可能加剧。

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很难夸大其词。生育率的下降有助于减少很多女性生儿育女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女性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权能，并使女性能够更积极地加入有偿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人们希望少生孩子的倾向。

从1970年至2020年，全球各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不断下降。在初始生育率高的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往往更为明显，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趋同。非洲和欧洲目前分别是生育率最高（4.3）和最低（1.6）的地区。

如果人口的年龄结构显著偏向最佳生育年龄的人口，那么在中短期，即便生育率只有2.1，仍

能带来人口正增长，因为已生育的女性数量可以抵消女性的低生育率而且有余。这个人口动态特征被称为人口惯性，可以连同国际移民一起解释为何即使生育率低于2.1，仍有6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保持增长。

国际移民也与人口增长相关。在一些国家，移民效应非常重要，例如圭亚那、萨摩亚、汤加；在过去30年，这些国家的净移民人口极其庞大。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净移民率最高。在世界十大人口大国中，美国的移民相对占比最高（2019年为15%）。但是，对多数国家而言，国际移民还不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主导力量，因为全球96%以上的人口目前居住在其出生国（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借助移民扭转乾坤？”）。

年龄结构动态

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反映出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历史。在死亡率高的人口中，生存率的提高往往多发生在儿童身上，因此这有效地催生了婴儿潮。最终，由于人们意识到儿童生存率的提高，生育率开始下降，同时理想的生育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降低，因此生育潮逐渐结束。但是，随着相对庞大的婴儿潮一代度过青春期，逐渐步入成年，处于最佳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增加，储蓄开始上升。

这提高了经济体的人均产能，并为收入的快速提升和脱贫打开了机会之窗。过去10年间，全球发生了诸多事件，从阿拉伯街头抗议到智利、苏丹近期发生的大规模抗议，这些所有事件都显示：未能为大量青年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的国家很容易遭遇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

“人口红利”指的是年龄结构的变化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当然，这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

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的本质和速度、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运作、宏观经济管理和贸易政策、治理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不过，人口红利模式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既往经济运行方面存在的差异（如东亚相对于拉丁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有助于识别国家形势是否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例如，从2020年至2030年，尼泊尔、约旦、不丹和斯威士兰预计将在劳动适龄人口与非劳动适龄人口之比上实现全球最大增幅。

抚养比（即劳动适龄人口与非劳动适龄人口之比的倒数）衡量的是除了支持自身之外，劳动适龄人口在抚养非劳动适龄人口方面所面临的经济压力。1990年，在较发达的地区，该比例明显低于欠发达地区（0.68比1.04）。

但是，到2020年，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模式各不相同，在较发达地区，该比例增至0.70，而在欠发达地区，该比例降至0.75。到2050年，较发达地区的抚养比（0.89）预计将高于欠发达地区的抚养比（0.77）。这种转变说明，在未来数十年内，相较于较发达地区，人口将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福祉。在非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预计到2050年，非洲将是唯一抚养比降低的地区。

对于尚未经历显著人口结构转型的国家（如乍得、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和塞拉利昂），促进这种转变是他们的政策导向。这样的政策包括通过投资提高婴儿和儿童存活率，例如扩大疫苗覆盖率、提供更多人员配置充足且恰当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渠道。

对于人口健康度和存活率双双提高的国家，他们可以从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政策中受益，这些政策包括普及女童的教育，扩大获得有关生育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的渠道。

对于拥有相对庞大的处于高收入、高储蓄生命阶段的人口的国家，他们需要制定政策，获取有利的人口特征所带来的潜在益处。这样的政策包括支持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作、增加人力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宏观经济管

理、审慎设计贸易政策，并提高治理能力。这些都是比较理想的政策，而庞大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会增加风险。

在一些国家，对上述各项政策进行投资可能会带来挑战，因为相较于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当处于相同的人口阶段时，这些国家当前的实际人均收入低于发达国家。

全球老龄化

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大批人士步入老年，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最主要的人口趋势。如此庞大的人群步入65岁的门槛（传统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我们预计，在未来30—40年，全球将在现有7亿多老年人口的基础上再增加10亿老年人口。在老年人口中，8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增速尤其明显，预计在未来80年内将超过5亿。这一趋势十分重要，因为85岁以上群体的需求和能力往往与65—84岁的群体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人口老龄化，但这一现象的进程却千差万别。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达到2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到2050年，29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当前的水平。事实上，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最终将超过日本，达到前所未有的38.1%的水平。日本目前也是年龄中位数最高的国家（48.4），其年龄中位数是非洲（19.7）的两倍以上。但是，到2050年，若以相同标准衡量，韩国（2050年的年龄中位数为56.5）预计也将超过日本（54.7）。

而在30年前，世界年轻人口（15—24岁）是老年人口的3倍以上。从当前开始的30年后，上述这些年龄段的占比将大致相当。

按收入群体划分，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将是目前的中等收入国家。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达到74%。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老年人口占比

在老年人口中，85 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增速尤其明显，预计在未来 80 年内将超过 5 亿。

的增速远远超过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此外，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时，当前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预计将显著增加。这与当前普遍持有的发展中经济体未富先老的观点恰好相反。

中等收入国家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缺乏足够的收入照顾老年人，而是如何通过完善的机构和政策，以持续的资金投入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感。人口老龄化正给全球敲响警钟。对全球公共和私营政策制定者而言，人类寿命的延长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的健康有关是其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亟须解决的问题（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长寿且优质的生活”）。

经济学家们仍忧心忡忡，其中的原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短缺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下行压力，以及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将投资变现维持生活而导致的资产价格下跌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与财政压力有关。由于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预计将进一步提高，与此有关的养老金债务以及健康和长期看护成本也将提高，从而使政府承受资金压力。然而，尽管老年人通过志愿者工作和看护服务等卓有成效的非市场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经常被忽视，但却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克服上述这些挑战。

由于世界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缺乏既往经验，我们共同的未来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然而，以一切照旧的方式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可以采用多种措施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这些措施包括开展政策改革，以促进财政可持续以及卫生和养老金融资代际公平。在过去数十年，各国的法定退休年龄都保持相对稳

定（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如何让人们体面地老去”），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也能缓解负担。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税收激励也是一个长期政策选择，但其对生育率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其他方法包括，通过让民众进一步认识到体育锻炼的好处并提供相应补贴等方法使医疗系统增加对早期检测和疾病预防的重视。针对来自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国际移民，降低对其的体制和经济壁垒也能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最后，技术创新也可能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此类创新中的两项为：推出新药减缓老龄化进程及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发明和部署机器人等辅助设备。推出家庭医疗新模式、改善公共交通系统、设计城市布局、推出金融工具等体制创新方法也在不断涌现。

人口变化的要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以来，全球、地区和国家的人口指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未来数十年内，同样显著的变化仍将上演。在全球人口现象中，人口老龄化仍将取代人口增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已经对有关经济福祉和发展的各种指标和决定因素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仍如此。然而，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对个人和公共福祉的影响也不会保持不变。FD

大卫·E.布鲁姆（DAVID E. BLOOM）目前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经济与人口学教授。